

东北学

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刘中树 /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 刘中树 著

艺术论

《呐喊》
彷徨
Na Han Pang Huang

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呐喊》《彷徨》 艺术论

刘中树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呐喊》《彷徨》艺术论

刘中树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黄曼萍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永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8.625 插页：4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1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01-2314-7/I·114

定价：13.50 元

总 序

刘中树

文化发展与地理位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这似乎可以叫做地缘文化学。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中的深切体验。

相对于内地中心城市，特别是京沪等地，东北无疑属于边远之地，文化的积累较薄，既无中原的厚重，又无江南的活跃。因此，多少年来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始终未能解决自身定位的根本问题，而这又是一个被忽略、被淡化了的问题。

有人以为，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要突出地方的特色。就现代文学而言，就应该立足本地，研究东北的作家作品。这种思考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切合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被冷落或忽视。像吉林省的骆宾基、李辉英，特别是两位名噪一时的女作家梅娘、英娘。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仅要立足本地，更要面向全国和世界。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当代文化使每个人都享有这种权利。对于人类和民族普遍性课题的研究不属于哪一地域和哪一人群的特定专利。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中华文化与东北文化历史关系的思考。

东北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由于清兵入关和“九一八”事

变，东北才因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而被人关注。于是才有了满清史志，有了“东北作家群”。然而一提到东北文化，在过去人们心目中呈现的还只是“棒打獐子瓢舀鱼”的未开化形态。“罪臣”的流放和关内移民的进入，东北文化才出现了不小的繁盛景象，亦只不过被认为是单纯的中华文明的流转、辐射，不具有区域文化的特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东北地区古人类化石（如金牛山人化石、安图人化石）的发现，证明28万年以前东北大地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特别是1983年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在5000年以前，东北文化就是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共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关于东北文化单纯移植性的认识。至少，东北文化的本源性和移植性开始成为东北文化共同的构成条件。由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东北文化作为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的区域文化，既有华夏大文化系统乃至人类远古文明的共同属性，而且又因历史和地域的特殊原因，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素质。也就是说，东北文化构成的自在性也存在于接受性之中。正是在这一认识上，形成了我们关于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

以上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层面。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入一步表现出对整个人类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即对人类和民族的共同问题发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当代学者应具有的时代素质。文化的特殊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文化的根本标志，不同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体。东北文化的特殊性使其在中华文化的大系统中占据了特别的位置，而对这一特殊性的发掘亦是强化东北文化地位的重要方式。但是，对于这一特殊性的强调必须以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为前提。而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和中国共同问题的关注，也是对文化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承认。作为东北现代文学界的同仁，我们一方面要义不容辞承担起对东北现代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另

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与国内学术界同步，从时代的高度对有关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这种声音是高是低。

多年来，东北学人在一种不十分有利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踏实而富有特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国内乃至海外学界瞩目的成果，并且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不仅立足于本地，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地理优势深入进行有关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时刻关注国内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状态，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就是各位作者在此意义上所弹奏出的新的旋律。

丛书的作者中有老一代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是他们近年来最新研究的心得。

目 录

山重水复 寻幽探胜：说不尽的鲁迅	
小说研究话题	1
《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与狂人形象	18
《孔乙己》的小说技巧	38
《药》的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艺术	45
《一件小事》的写人	52
《阿 Q 正传》的思想和艺术	61
丰富深刻的《呐喊》《彷徨》	85
《呐喊》《彷徨》的艺术特色	105
《呐喊》《彷徨》：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 思想艺术结晶	141
附录一 鲁迅著作评要	159
附录二 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鲁迅年谱	186
后 记	266

山重水复 寻幽探胜： 说不尽的鲁迅小说研究话题

鲁迅一生创作出版了三本小说集：《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初版收入1918年至1922年的作品15篇，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印行；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是《彷徨》，初版收入1924年至1925年的作品11篇，除《孤独者》、《伤逝》两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外，其他原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于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故事新编》是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收入1922年至1935年的作品8篇，初版于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印行。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现代白话新小说最先显示了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出现，立即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文学界的研究兴趣，可以说鲁迅研究的历史就是从鲁迅小说研究发端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小说研究的话题绵延至今，经久不衰。

在20年代，人们主要是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历史任务，从思想革命和提倡白话新文学的视角来评介鲁迅小说的。这些评介虽然不是全面评价，但却对鲁迅小说作品做出了肯定的有见识的论评。最初的有代表性的感想式的评介文章是傅斯年的《一段疯话》和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1卷2号上专文介绍了《新青年》杂志，特别肯定了《新青年》刊发的鲁迅的《狂人日记》“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小

说”。1919年4月1日《新潮》1卷4号发表傅斯年的《一段疯话》，赞美了《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疯子精神，指出人们应该视狂人为老师：“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敬爱的是孩子，疯子是老师，孩子是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老师走，走向光明。”对照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疾呼的不要让孩子步父辈的后尘，唯肖其父，父辈应该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应该说上述傅斯年的话是理解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旨趣的。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刊出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吴虞说他是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启发，“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才写出了这篇文章的。如果说《狂人日记》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那么《吃人与礼教》就是从理论上逻辑地剖析阐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吴虞充分地肯定《狂人日记》明晰、深刻的反封建主义精神，明确写道：“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这种社会批评式的评论，更直截了当地揭示了《狂人日记》的主题及其意义。

掀起鲁迅小说研究第一个热潮的是《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的出版。《呐喊》、《彷徨》出版后，反响强烈，研究文章频出，形成热波，并由此波展开来，不断深入发展。

关于如何评价《呐喊》、《彷徨》的讨论，首先掀起了这一研究的热潮。1924年1月《创造季刊》2卷2期发表了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成仿吾从尊重个性、表现自我的主情主义出发，在文章中对鲁迅小说做出了与茅盾发表在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的《读〈呐喊〉》等不同的评价。茅盾认为《呐喊》中的小说都是写实主义的佳作，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风波》到《阿Q正传》“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他说：“《阿Q

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而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对《呐喊》做了粗暴的贬抑，认为“《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极主张的记录（document），固不待说；《孔乙己》《阿 Q 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亦不待说；即前期中最好的《风波》，亦不外是事实的记录，所以这前期的几篇，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他甚至不承认《一件小事》是小说，只不过“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别的几篇也不外是一些记述（description）”。对《呐喊》的艺术描写，成仿吾也予以否定的评价，说什么“赞《呐喊》的人都赞作者描写的手腕，我亦以为作者描写的手腕高妙，然而文艺的标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而且我以为作者只顾发挥描写的手腕，正是失败的地方”。他在文章中除了用一些“拙劣”、“失败”、“庸俗”等字眼外，还以“用字不甚修洁，造句不甚优美，还有些地方艰涩”等话语贬低《呐喊》的艺术表现技巧。侥幸得到肯定的《端午节》、《不周山》，不过是使成仿吾“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已。到了 20 年代末，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成员接受了苏俄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理论影响，缺乏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和正确把握，其理论主张的左倾色彩较浓重，这种幼稚的左的理论主张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鲁迅及其创作的评价。钱杏邨发表在 1928 年 3 月号《太阳月刊》和 5 月《我们月刊》创刊号上的《死去了的阿 Q 时代》，据作者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附记中所说，是“完全根据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野草》三书而作，一切的论断也依据这三本书而定”。钱杏邨肯定鲁迅的论文杂感与翻译，贬抑鲁迅的小说。他从《阿 Q 正传》评论入手，阐述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断言“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

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他还认为《呐喊》、《彷徨》“大多数是没有现代的意味！不仅没有时代思想下所产生的小说，抑且没有能代表时代的人物！”至于说到《阿Q正传》，钱杏邨则认为：“《阿Q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而且“《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把鲁迅描绘成时代的落伍者。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不同分析，必然导致对鲁迅小说创作价值的评价的分歧。矛盾的《读〈呐喊〉》充分肯定鲁迅小说认识人生、反映人生的意义，以及在艺术上突破传统束缚的创新；而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则否认鲁迅小说的创作价值，说：“假使《呐喊》有一读之价值，它的价值是后期的几篇；假使作者关于自己有所表白于我们，那便是他的复活。”成仿吾、钱杏邨对鲁迅及其创作的否定评析，在理论主张上和思想倾向上，与当时创造社成员对鲁迅的错误认识和批判是一致的，这与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的错误观察和分析是不无关系的。无疑，他们的评价是武断、片面的，很多人都发表了与他们不同的见解。Y生在《读〈呐喊〉》中说：“就创作小说而言，也不过几种，其中有独树一帜特殊的作用，收效最大，最使我们满意之作，就要首推一位化名‘鲁迅’君新近出版的《呐喊》了”，“《呐喊》确是今日文艺界一部成功的绝好的作品。”^①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读《呐喊》，读那篇那里面最可爱的小东西《孔乙己》，我们看不见调色板上的糊涂和广告单上的丑陋，我们只感到一个干净。《呐喊》的作风所以产生了许多摹仿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单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也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事实是在一切意义上他是文学革命后我们所得了的第一个作家。是他在中国文学

^① 见1923年10月16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史上用实力给我们划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他并没有高唱文学革命论。”^① 青见在《阿 Q 时代没有死》里，通过对农民觉悟程度的分析，直言反驳钱杏邨的论点说“阿 Q 时代没有过去”^②。就是与鲁迅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有着根本分歧的胡适，也承认“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 Q 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③。产生争论是不奇怪的，鲁迅说过看人生因作者不同，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文艺观和批评标准不同，自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同。争论也不是坏事，通过争论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声的《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就发出了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不同的声音。一声指出：“他的小说表现的是他对于现在的悲观，而论文所表现的却是他对于现在的不满和对于将来的希望。有人说过他是用医生诊视病人的态度去写小说的。这话如果不错，那么，他当然是用泼皮（华盖集 21 页）打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的态度去写论文的了。在前者，他用的是解剖刀，在后者，他用的是短棒。他对于封建社会和他的遗孽是如此的仇视，憎恨，憎恨到使他丢了医生的解剖刀，变成泼皮，拿起短棒，去和他们相殴相打。他的论文所攻击的对象都是所谓礼教，所谓国粹，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等等一类的封建思想。除了以推翻整个的旧制度为专业的共产主义者而外，在中国的思想界中，像鲁迅一般的坚决彻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论，是很少的。因此，他比资产阶级的思想更进了一步，因为资产阶级之

① 见 1925 年 1 月《现代评论》。

② 见 1928 年 6 月 11 日《语丝》第 4 卷第 24 期。

③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4 年申报馆版。

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向来是不彻底，带有妥协色彩的。”^① 画室（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则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知识阶级的特点，并把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指出：“鲁迅自己，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文化批评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此，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艺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中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所以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到了现在，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也仍立在向来的立场上，同时也常常反顾人道主义。”^② 一声和冯雪峰都把鲁迅视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朋友，尽管他们的论点也有片面、不甚准确之处，然而他们对鲁迅坚定的反封建主义精神和鲁迅在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历史作用的肯定都是无可辩驳的。他们赞扬鲁迅是彻底的反封建的战士、新文学的创造者。

显示初期鲁迅小说研究的成绩和水平的还当首推雁冰（茅盾）的《读〈呐喊〉》和《鲁迅论》（1927年11月《小说月报》十八卷十一期）。茅盾在《鲁迅论》中慧眼独识地指出：“《呐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除几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猫》、《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呐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地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

① 见1927年2月21日《少年先锋旬刊》第2卷第25期。

② 见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中国书店1929年10月初版。

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正是围绕在我们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国的人生！”“《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根本原因便在这一点。”茅盾的《鲁迅论》融鲁迅的思想、杂文和小说创作为一体加以评述，做出公允、科学的评价，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进入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反革命“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尖锐、复杂的斗争背景下，对鲁迅及其创作的研究、评价，又与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潮的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论争联系起来，这不仅推动了鲁迅研究更广泛地展开和深入，也使对鲁迅及其创作的研究与评价带有了思想文化斗争的色彩。

30年代鲁迅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主要表现为更着重鲁迅思想的探讨和鲁迅精神的阐扬；对鲁迅创作的分析、评价也更注重了艺术赏析和理论的阐述，而且视角也放宽了。

为了正确地理解鲁迅、宣传鲁迅，瞿秋白在1933年3、4月间，从鲁迅写于1918年至1932年间的杂文中选出76篇，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序言，于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瞿秋白在序言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鲁迅杂文入手，结合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述鲁迅的思想特征、思想发展和鲁迅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序言不仅批驳了对鲁迅及其创作的错误评论，而且对鲁迅及其创作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尽管某些论点不无简单化之嫌，但其仍不失为标志这个时期鲁迅研究新高度、新起点的代表作，把鲁迅研究引向了深入。另一位对鲁迅及其创作做出深刻分析和高度评价的是冯雪峰，他在写于1936年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一文中，把鲁迅及其创作置于中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背景中进行

考察，认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写实主义者”，“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①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论点。瞿秋白、冯雪峰的论点代表着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鲁迅及其创作的批评家的认识。在1930年7月16日《现代文学》第1期上发表的邢桐华致编者的信中，邢桐华就把鲁迅视为“是自从《新青年》时代以来，唯一的一位最坚强最勇敢最急进的思想家兼艺术家”，“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②叶宜在《鲁迅杂感选集》中、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中也都表示了对何凝（瞿秋白）论点的赞同。^③周立波的《试议阿Q》，对阿Q进行时代的阶级的分析，指出阿Q这个艺术形象的“精神胜利的怒目主义”，“是南方中国的小农，经过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无代价的牺牲以后的一种失败心理的特殊表现”^④。特别是左翼文艺批评家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鲁迅小说创作的理论意义，关于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论争，就与阿Q艺术典型的论析紧密结合着。

1936年1月，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印行，收入1922年至1935年取材于古人古事的小说作品8篇。最初对《故事新编》的评论虽然带有随感性质，

① 见冯雪峰的《鲁迅的文学道路》（论文集），第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转引自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第8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叶宜：《鲁迅杂感选集》，载1933年8月14日《华北日报》；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4年12月初版。

④ 周立波：《试议阿Q》，《读书生活》3卷3期，1935年12月。

但却都做出了中肯的评析和肯定的评价。宗珏在《故事新编》印行的当月，就在《北平新报》上发表短评《鲁迅新小说——〈海燕〉第一期的〈出关〉》，认为《出关》“虽则并不算长，但确然是一篇坚实的小说”。紧接着他又在介绍《海燕》月刊的文章中论及《出关》，称赞说：“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度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① 岑伯在《〈故事新编〉读后感》中认为：“《故事新编》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里面所写，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对于历史而言，真是‘信口开河’的，所以这到底总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② 两位评论者都肯定《故事新编》是采用历史题材讽喻现实的小说。

应该说 30 年代的一些鲁迅研究者已经认识到鲁迅在中国革命和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思想、人格和创作等多方面地开展了研究，而且注意把鲁迅放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运动中，具体地剖析鲁迅的人格、气质、生活和作品，从中阐述鲁迅的思想、精神和创作，把鲁迅作为活生生的人，细腻、具体、形象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展现鲁迅及其创作的独特风貌。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批评“学究式的研究”，提出要研究和学习鲁迅的“战斗的精神”、“战斗的技术”和反“公式主义”。^③ 欧阳凡海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中提出：一要分析研究鲁迅作品所受各方面的影响，文学才能的借鉴和革新；二要在当时的社会联系中剖析作品人物的思想性格、创作方法的演变过程；三要分析作家幼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全部生活史，在文化与私人方面所受的

① 宗珏：《海燕》，天津《大公报》1936 年 2 月 7 日《文艺》副刊第 89 期。

② 岑伯：《〈故事新编〉读后感》，《时事新报》1936 年 2 月 18 日。

③ 茅盾：《研究和学习鲁迅》，1936 年 12 月 1 日《文学》7 卷 6 号。

影响等等。^① 30年代的鲁迅研究视野确实是较宽的。景宋（许广平）的《鲁迅先生的精神》（1937）、曹聚仁的《鲁迅的性格》（1937）、郁达夫的《鲁迅的伟大》（1937）、何典的《鲁迅与尼采》（1939）、苏雪林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1934）、孙伏园的《谈〈药〉》（1936）、刘大杰的《鲁迅与写实主义》（1936）、唐弢的《鲁迅的杂文》（1939）、孔嘉的《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1939）等，说明研究的领域是拓展了。

40年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决战并走向胜利的年代。这时鲁迅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的《论鲁迅》（1937）、《新民主主义论》（194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等，高度地评价了鲁迅精神，赞誉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权威地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40年代及以后的鲁迅研究的方向，推动了鲁迅研究的发展。

全面、系统地开展对鲁迅思想特征及其发展道路的研究，是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重要发展。雪苇的《鲁迅先生思想的“转变”与概观》（1940）、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1940）、艾思奇的《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1941）、周扬的《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1941）、何其芳的《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1942）、郭沫若的《庄子与鲁迅》（1941）、《鲁迅与王国维》（1946）、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1948）等，都多侧面、多层次地对鲁迅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乏深刻的见解。特别是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更深化了鲁迅研究，

^① 见1936年12月1日《文学》7卷6号。